既能以平实、简易的文字书写，又不忘遵守学术的一般规范，这是比较出色的通俗著作的基本要求。伊沛霞教授的《宋徽宗》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可以同时兼顾面向西方一般历史爱好者的阅读需求，亦可当作围绕宋徽宗研究的一次比较成熟的综合。

作为一本研究宋徽宗的当代历史著作，作者试图超越传统史学出于后见之明的道德偏见，“努力从徽宗的角度来看待各个时期，并不知晓多年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作者寄予徽宗了相当的同情。不过围绕徽宗个人的写作也有另一种缺陷，固然避免了作者对正史本纪中干涩、缺乏个性的事迹年表罗列的批评，但本书没能够充分关注那些至关重要的历史事件，焦点几乎全在徽宗个人，而其所处的制度、君臣交互、事件冲突所得到的笔墨不算充足，致使一些历史大事读者只能得到碎片化的叙述。同时那些徽宗同时代的重要人物，如蔡京、童贯等人，我们也难以从本书中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形象，本书唯一的主角只是赵佶。

从本书篇目的安排中，可以初步窥探在作者的心目中，徽宗是怎样一位皇帝。作者将本书的安排分为四个部分，只在第一部分“初涉国政”中，我们能隐隐约约看到一个尝试积极履行职责的徽宗形象。第二部分“致力辉煌”和第三部分“展望伟业”中，徽宗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参与和政事无太大关系的事业，或是道教的仪式，或是艺术工作的开展。到了最后一节则是难堪的悲剧，徽宗干脆舍弃了自己作为皇帝的责任，却未能避免失败的到来。之所以说作者对非个人化的外在环境关注不足，是因为徽宗的悲剧并不只是其个人的悲剧，其皇帝的身份决定了后果牵涉面之广、影响之深都不能仅仅以个人的角度加以消化。不能充分将灾难的状况加以考虑，对徽宗个人的同情性观点在有批判精神的读者那里也会大打折扣。

评价徽宗，关键性的问题，是北宋覆灭的责任归属。就笔者已经阅读的资料来说，不妨在此做一个简要的综合。首先就外部的不利环境来说：一，作为都城的开封在战争中的地理位置上具有先天不足；二，北宋军队老生常谈的庞大却虚弱的问题；三，女真人崛起的突然与内部的造反同时发生。对于那些短时间内无法通过有限的人力主观加以改变的事情，我们自然无法将其作为某人的罪责，上述的这些问题都属于此，且哪一个单独拎出来都不算严重，但徽宗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只是完全无辜的受害者，他的所作所为令危机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以至于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我们在评价人物之前，首先应当考虑我们是以怎样的标准来加以评价。如果以普通人来说，赵佶的为人算不上太大问题。即使以一般皇帝的标准，即历史上大多数时候来看，赵佶都是勉强算合格的，没有过分干预行政(从作者对徽宗行使皇权的描述中，我们很难得出“专制独裁”的印象，相较于北宋之前的皇帝来说，徽宗的“专制”程度也未特别突出)，有些过度但还算不上穷奢极欲的私人享受，放在承平时代，大概徽宗也能得到庸常之君的评价。但他偏偏处在一个并不稳定的时代，北宋的繁华固然无与伦比，但却是不稳定的，特别体现在与外部的关系中，如果不是宋人对于幽云十六州持续的渴望，也不会导致徽宗错误的冒险。在历史变动的巨大机遇与危险中，稍有差池便是巨大的灾难。对于徽宗以及宋朝来说，最大的悲剧和错误或许就在于在历史的转机点上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在皇帝的位置上。这反映了从秦汉发展到北宋的政治制度的一个固有缺陷，系统在危急关头的自我调节不足且迟钝，相较于唐代，北宋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使得这一缺陷被放大到了不可承受的地步。但可惜的是，唐亡后尚还有宋代能吸取藩镇的教训，宋代则无得以继承。